

一位年轻的同事遇到我大叹苦经:好不容易盼着儿子上了小学,本来以为从此可以不管穿衣吃饭、游戏玩乐,乐得轻松了。可是,怎么也没有料到,自打进了小学门,我和他妈就没有安生过。我很奇怪,就问是不是现在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就很重?这位同事又是一声长叹:问题在于,我们做家长的天天都被老师紧紧地抓住了!我有些不理解,他接着说了我几乎随即目瞪口呆的事:天天都要给儿子的各式各样东西签名,作业签名、复习签名、预习签名、测验签名、考试签名,还有五花八门的活动签名……

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了。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读小学中学,也有家长签名的,但只是在一学期终了的“学校家庭联系册”上要签名,那上面有考试成绩、品德评语之类。不多,也就是一个签名。二十年前,儿子上小学中学,好像和我们那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一学期一次吧。怎么到了21世纪了,我们的家长倒要天天签那没完没了的名?

我的这位同事还义愤填膺:小孩刚进校门,老师第一件事就是要家长写出手机号,而且爸爸妈妈都要有。有了手机真是方便呀,老师可以随时随地拨打手机,内容基本上都是投诉

控告,什么上课做小动作啦不安心听讲啦和同学吵架啦和老师顶嘴啦。最可怕的是,手机语言干脆利落:马上到学校来一次。弄得我和他妈心惊肉跳、三脚并作两步、扔下一切立即往学校跑——我已经得了手机恐惧症,一听手机响,就会心动加速、浑身哆嗦。

家长成为“人质”

马以鑫

我望着这位同事,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家长成为“人质”?

也许,现在的小孩多为独生子女,老师知道孩子在家长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把什么都往家长身上推、什么都要紧紧拽住家长,我觉得,是不是老师想推卸责任,或者是首先说明孩子的一切都要由家长负责?就拿每天的作业复习预习都要家长签名,就是意味着家长都要明白都要清楚都要了如指掌?以后小孩的变好变坏,那么责任人就是家长,到了某一天,老师可以变得毫无责任,为什么?因为一切的一切,你家长应该是早就知道了解的,同

老师学校又有何干系?

我估计,对于家长的这种“人质”地位,家长没有谁会乐意高兴,但也不敢反对,其原因就是怕得罪老师,而让自己的孩子穿上小鞋——那以后的日子就会越想越恐怖了。而学校和老师到时候就会把一切都撇得干二净,而且是勿谓言之不预也。想想也是,真的学生成绩不佳、出了什么事情,有些家长还真会上学校门。

看来,现在这种“人质”情况形成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但是,把家长弄得苦不堪言、疲于奔命,总归不是一个办法。我特别欣赏圣经里的一句名言: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人类社会总有分工。当孩子进了学校,家长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是管好孩子的生活,而老师就是要教好学生,使孩子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健康发展。这里应该有不同的分工,或者说侧重重点。

现在的麻烦是,很多地方搞混淆了,家里几乎成为学校,而家长还得进修各类课程。可不么,老师还有学科的区别,教什么都有专业。可对家长,那可不得了了不得,语文数学外语外,还有音体美,还有多种兴趣班,都得成为内行都得成为辅导,乃至行家里手的老师。

在家看电影,我常常喜欢挑一些带有中文配音的影碟。看了很多年电影,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电影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译制片,这就少不了配音。“文革”期间,国产新电影停止摄制,老电影停止放映,撑市面的就是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了。在我的印象里,朝鲜电影大多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阿尔巴尼亚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对银幕上出现的外国人面孔中国人声音,我小时候一直很好奇。那时上海译制厂在万航渡路,我有好几次偷偷跑去看了,当然,对那时的配音演员不熟悉,知道邱岳峰、毕克、童自荣、刘广宁等,那还是以后的事。后来上译厂搬到永嘉路上,我倒是去“追星”了,不过,心仪的明星一个也没有见到。上海电影译制厂,“文革”中改过名,阿尔巴尼亚《海岸风雷》就是由“上海工农兵电影译制厂”译制。改名在“文革”中是一大奇观,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改成“东方红”,和平则改成“战斗”,现在想来,真觉得好笑。

上译厂在万航渡路时,条件很艰苦,赵慎之说:“那时下起雨来,我们的休息室,水都到大腿根,痰盂罐臭啊,在屋子里头都漂着。”曹雷说:“放课间叫奶奶窗,一般放时要用窗帘遮起来,没有好窗帘,用的是像《白毛女》奶奶庙里的破窗帘。”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老译制片艺术家为我们供奉了精神食粮。

对于一部配音的译制片,从外行来看,觉得有些理所当然,电影里的主角就应该这么说话,其实,外语无论音节、语调、节奏,和汉语不尽相同,所以,对口型是一门很重要的技术活,这就要求外语的音节和汉语要一致,在翻译时,就要预先考虑好。曹雷曾说起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这样一段故事:“他在翻译的时候,还不断拿手在桌子上敲,这一句话里头,按照英

文音节可以说几个中国字。他常常在吃饭时,吃着吃着,就想起那句词了,手就开始在桌子上动。去世之前,弥留状态,人已昏迷,他女儿看见他的手还在那儿敲。”老译制片人的精神可见一斑。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电影里列宁那个浑厚苍劲、饱满有力的声音竟来自当时还只有23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白景晟。他把列宁的喉音都表现出来了,连苏联的专家,都称赞他的声音很像列宁。他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的努力,他儿子说:“父亲把列宁演讲的胶木唱片带回家,总是在听,模仿。”

在上译厂,有许多著名的配音演员。我最喜欢的是邱岳峰,虽然别人都认为他的嗓音瓮声瓮气,锐利且带点沙哑,先天条件不算好,但他硬是用自己的先例,创造了配音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他的带有磁性的嗓音,很多年来一直迷醉着我,《简·爱》的罗切斯特,《警察与小偷》的小偷,他的声音与角色是那么相契相合,仿佛那些个洋人,就该这样说。邱岳峰自杀的时候,我已在大学读中文系,很多同学都是他的“粉丝”,听说此事,顿时沉寂不语,悲痛和吃惊,以及遗憾、不解,紧紧缠绕着我们。我也喜欢童自荣的清亮、刘广宁的清纯、毕克的深沉、尚华的厚实……现在,我每一次重看这些老译制片,电影里形形色色的外国演员,和老一辈配音表演艺术家的声音,就融合在一起。有的电影,

配音超过了内容本身,成为经典。我欣赏这样一句话:配音是“为别人的面孔,创造声音的灵魂”。那些经典的声音灵魂,对我来说,就像小时候上海黄昏的台路路、石库门门口的马桶、亭子间飘荡的饭菜香、马路上叮当开着的有轨电车,融注在我的血脉里,成为我永久的珍藏。

声音的灵魂

刘伟馨



读碟

不欺

青衫

年关将近,母嘱女携货去市场,曰:中有次品,杂糅其间,逢老人鬻之。女问奈何独欺老人,答老人目昏,难辨优劣,果有老人鬻篮,几呼老盖坠地,女不忍,几老回:“此为次品,应以半价售。”老奇,当今无商不奸,女如此诚笃,稀哉!

女归,母问何以少钱?女曰腹饥,买食果腹,谎言亦善耶!经商不欺,夜也安枕!



夜光杯

曾听陆耀良讲旧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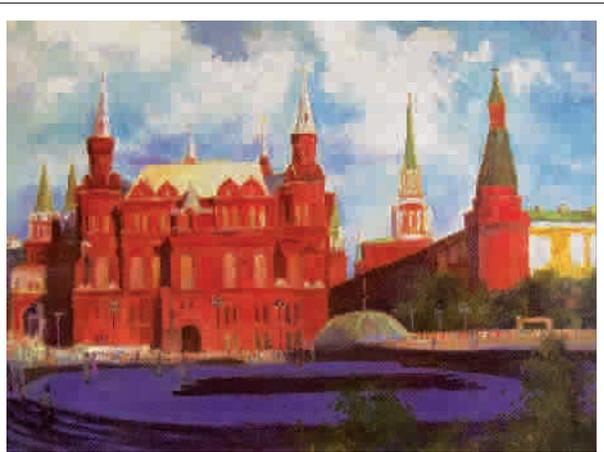
杨忠明

去年12月3日随作家沈善增先生去兰心大戏院观赏庆祝上海市曲协成立五十周年评弹专场演出,惊喜苏州评话大家陆耀良先生于前一日仙逝,心中难过,陆老慈祥儒雅之相犹在眼前……

记得六年前我去厦门路石库门老屋拜访陆耀良先生多次。老人同我讲了许多评弹佚事,还宴请我们到酒家吃老上海菜,同聚者有周家盛、李唯、应明森等书法篆刻朋友。陆老回忆,他幼时喜欢到

观前街玄妙观露天书场听书,十几岁拜了先生,跟着到常熟、无锡、娄塘等处走穴。后来他到上海,先到七浦路三星园小书场去试说《三国》获得好评,小书场都来请他说……再后来帮说《描金凤》的“描王”夏荷生救场七天,名声大振。

他说,旧时说书人肚里货色(学问)要多,人要有书卷气,文史、戏曲、小说、民俗、民风、科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样样要精通,学到的知识融入表演中,他曾汲取京剧演员马连良的表演风格,使何派《三国》细腻风趣的特色得以继承发扬。评弹



红场一角 (油画) 徐裕根

龙年岁末再说龙

张明华

龙年岁末,新华网上某教授的一篇文章将“龙的传人”说成是“羊的传人”,被多家报纸转载,一些网站甚至作为24小时滚动新闻刊发,引起一片哗然。其实,关于中国龙,褒贬之说、奇谈怪论、一惊一乍的事情时有发生。记得去年初发行壬辰年的生肖邮票,就发生过一点风波,有人嫌龙的形象有点凶,太过霸气,也有莫名其妙者上纲上线到了我国的外交路线。说实在的,龙虽然不是自然界的生物,但是传统的、得到大家认可的形象就应该具有腾飞向上的姿态和性格,呆头呆脑,缩手缩脚岂成龙样?把“龙的传人”用咬文嚼字的方式追究意识形态的龙与华夏民族不可能存在的生育关系来加以否定,这显然是一种并不高明的文字游戏。

我国古老的甲骨文中已有“龙”字,先秦诸多文献已说及龙,出土文物早至七八千年。就着笔者比较熟悉的、面目比较清晰的五六千年前的玉龙资料而言,内蒙古大草原最有灵性的动物是马,加上其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和巨大的承载力等,于是产生了长鬣飞扬的红山文化马首碧玉龙。熊的威猛和在辽西地区动物中的霸王地位,使红山文化先民期望它能在与大自然和部族斗争中赐予自己勇气和力量,由此产生了熊首白玉龙、牛在安徽凌家滩这一带历来是农家的主要畜力,赖以生存的伙伴。人们把这一任劳任怨,对农业丰产作出极大贡献的牛神化为凌家滩文化牛首白玉龙。浙江余杭瑶山、湖南澧县孙家岗白玉龙,湖北天门肖家屋脊蚌形龙,头形都似鳄鱼,而鳄鱼正是长江流域及江南水乡常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有人分析认为,鳄鱼总是在冬眠之后在春天破穴决堤造成水灾,人们以为鳄鱼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于是产生了鳄首玉龙……

繁多的龙型,说明中国龙在各地先民的心目中各有其尊崇、敬畏的动物祖形,龙的产生是多源的,不是唯一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还会导致新龙的出现。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中国商代青铜盃上的是人首双角龙,湖南西汉马王堆帛画上的是人形龙,江苏丁卯桥唐代鎏金银盃上的是鱼形龙,西藏大昭寺等唐代建筑上的是长鼻象首龙等等。显然,中国龙的起源不管是哪种动物,它的形象和初衷都是美好的,健康的,神圣的。可是长期以来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加以否定。

仅仅因为忌讳封建帝王对龙的一度独霸,仅仅为了不让外国人误解、害怕,或满足个人的喜好而愤然鄙视、排斥中国龙,小心翼翼、十分幼稚地去揣摩、迎合外国人的非分想法,这是对中国龙的起源缺乏了解缺乏自信的轻率行为,也是对中国优秀传承有意无意的涂炭。环顾国际上各种利益驱使下排华势力的虎视眈眈、无理取闹和层层壁垒,欲加之罪是永远避免不了的。可想而知,今天我们哪怕用一只温顺的小熊猫、一只可怜的小蚂蚁来取代,也是无济于事,于事无补的。

作为图腾形式的一种表达,世界各国国徽上姿态张扬的雄鹰、凶狮、猛虎、怪兽,甚或是杀人兵器多得很,为什么就容不得本来就很好的中国龙的存在?其实,理解、欣赏、喜欢中国龙的外国人大有人在,即使是今年的海外邮市,美国版、法国版、加拿大版的龙票丰富多彩,照样大受欢迎。北京奥运会会徽曾以重器——龙钮玉玺形式呈现,彰显了中国人民对办好世界上最伟大、最隆重的体育盛会的无比珍视和满怀信心,深受奥组委的赞誉。中国龙非但没有让外国人害怕、仇恨,相反让人感到亲和、愉悦和神奇。

英姿勃发的中国龙,直上云霄,腾飞吧!

要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唐代诗歌无疑是重头戏,而《唐诗三百首》是普及率最高的选本。

读小学二年级时,我第一次接触唐诗——课文“古诗三首”。第一首是李白《望庐山瀑布》,第二首是杜甫《绝句》,第三首是杜牧《山行》。老师讲解,要我们想像诗中的景色。虽然没有到过真山真水,但诗中有山有水,有花有鸟,原来一千年前的古人用二十八个字就能写那么好看好听的诗歌。老师说,唐代的诗歌很多很多,有一本选集叫《唐诗三百首》,还说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老师特地把“吟”字解释了一番,可惜听了没领会。

放学后,我立刻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路上一翻,书是繁体字直排的,一行里只识得二三个字。从头翻到尾,课本里读到的三首好诗,竟然一首也没找到,莫非我买错了?通读《唐诗三百首》,已经是小

学毕业考完初中那个最惬意的暑假了。通读的结果,有的读懂了,有的没懂——不知道好在哪儿,但诗意境的美丽,感情的动人,尤其是语言的音乐性,我感受到了,但为什么唐诗有这么神奇的魔力,我说不出来。

“文革”开始,《唐诗三百首》也遭到“扫四旧”的丙丁之灾。我用历年压岁钱买到的一书架书和杂志全付荡然。我是逍遥派,躲在家里没有书看,形同坐牢。1967年初,我看到邻居屋角一龛上盖着本破书,没封面和封底,一翻,是线装石印本的《唐诗三百首》,我发现了沙漠甘霖!邻居是绍兴人,这本书盖的是“臭卤龛”——年老的上海人或江浙人都知道此物的功能。多一句闲话:这只臭卤龛是我的芳邻在抗战时从老家带到孤岛期上海的唯一宝物,作为原配覆瓿的《唐诗三百首》,真是几十年覆瓿。

接下来半个月,我将《唐诗三百首》仔细地抄写了一遍,弥漫的臭气令人窒息,但越抄越有劲。窗外是造反、混乱和荒诞、恐怖,书中是诗情、画意和陶醉、梦想。我决定每天背一首诗,一面背一面体味诗中意境,是享受,也是脑子做早操。我记得,一天背一首的功课持续约两年,背了大半本《唐诗三百首》,还背了《毛主席诗词》《鲁迅诗稿》和半本《宋词选》(胡云翼编注)。当时年半,背诵不累,记得牢。四十年了,现在还能背出不少,尤其是诗眼和名句。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流传最为广泛,影响很大的一种唐诗选本。三百首之数,仅占《全唐诗》的一百六十分之一。编选者衢

读《唐诗三百首》

张燮璋

塘退士,选诗的标准是“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眼力是高的,这大概是它风行海内,历久不衰的主因。作为非专业文学工作者,作为诗歌爱好者,把这么一本“普及读物”作为“经典”,推荐给大家。

从小学二年级到退休,我和《唐诗三百首》的因缘有半个世纪,至今还是案头读物,经常翻阅,兴致一来,放声背诵,醍醐灌顶,清气上升,和气理中,忘记自身已白发盈颠矣。我参加静安诗词社,有良师益友的提携,凭借几百首诗词打底,初步掌握了诗词格律,摹仿练习,敷衍成篇。社中同好,切磋琢磨,时有好评,暗自欢喜。我想这也算积极参与学习宏扬中国传统文化,此外,对防止老年痴呆也有作用。

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究竟是什么意思?

十日谈

阅读经典